中共党史资料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7

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中共党史资料

第七辑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

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 9.125印张 195千字
1983年10月第一版 1983年10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01—150,000册
书号：11310·5 定价：1.00元

目　录

文　献

忆友人詹大悲 ……董必武（1）

回　忆　录

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一）……李志民（21）
伍修权同志回忆录（之四）……（143）
——中联部八年（1958.10—1966.12）
一、初到中联部（1958—1960）……（143）
二、参加庐山会议（1959.8）……（152）
三、布加勒斯特会议（1960.6）……（156）
四、东欧四国党代会（1962.11—1963.1）……（168）
五、二去莫斯科（1963.7和 1964.11）……（189）
六、出席罗共"九大"（1965.7）……（206）
七、参加"四清"（1965.10—1966.4）……（211）
八、二访阿尔巴尼亚（1964.11和 1966.10）……（215）
模范的兴国　英雄的人民……肖华（226）

党在各地活动的史料

中国共产党黑龙江省组织沿革概况 （初稿）
（一九二一年——一九四五年）王景 金宇钟(264)

读者·作者·编者

敬告读者 ……(288)
来函摘登 ……(289)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忆友人詹大悲

（一九二八年四月）

董必武

编者按：这篇文章是根据湖北省博物馆提供的手稿编印的。我们请董必武文集组写了詹大悲简介并作了一些注释。原稿是董老早期参加革命活动的重要手迹之一，它主要记述了詹大悲的事迹，同时也反映了董老在大革命时期参加国共合作的不少重要史实，是一份珍贵的史料。

文章的标题是我们和董老文集组共同商定的。手稿开头缺页。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将全文分段并加了标点，其内容均照原稿排印。

詹大悲简介

詹大悲(1887——1927)，字质存，湖北蕲春人。少年肄业于黄州府中学，后入同盟会，任武昌《商务报》主笔。一九一一年初与蒋翊武等组织革命团体“文学社”，被推为文书部部长，并担任该社机关报《大江报》经理。同年八月，因该报刊登黄侃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药名也》等倡言造反鼓吹“极烈之改革”的文章，报社被封，詹遭逮捕，

此即著名的“《大江报》案”。武昌起义后詹被迎出狱，主持汉口军政分府工作。一九一二年被选为湖北省参议会议员。一九一三年赴江西参加讨袁战争，失败后逃亡日本，次年参加中华革命党。一九一五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再次被捕，袁世凯死后，始获释放。詹曾出席国民党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北伐军占领武汉后，曾任湖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湖北财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等职。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蒋介石新军阀以“共产党人”罪将他杀害于武昌。

……

……第一次省议会开幕未久，癸丑赣宁诸役① 相继发动，黎元洪特别嫉嫌他，遂藉事请议会将他和赵鹏飞、梁钟汉三人除名。议会自然照办。他那时任国民党的汉口交通部长，湘、鄂、豫、赣的党务均以汉口交通部为据点。黎封闭交通部，派许多侦探想捕他。他卒经由九江、安庆、芜湖、大通、南京而安然到了上海。赣宁失败后，袁世凯气焰大张，豢养侦探多人，专以谋捕革命党员为职。侦探中有退伍军人、地方流痞、绅士、妇女各种各色的人。他在上海和各方接洽革命事，袁氏对他特别注意。有一次已被侦探骗上马车，他在车上看见走的方向不对，遂一面和侦探谈话，一面阴以手持车门机关，乘侦探之不备，突以肘将车门撞开，身向车旁扑下，侦探急以手抓他的衣服，因

扑势甚猛，仅拉破罗衫一角。

后由直隶副议长王某与他接洽，约至张园相会，曹誓洁先去，即入圈套。潘怡如② 见情形已变，特通知他，所以他未遇险。袁世凯购他很急，卒与温楚珩同被捕。袁以为政治犯，租界当局必不引渡，故以伪造纸币案诬他，特请穆安素律师出庭申请。他的旧部刘老五，破获伪造纸币器械，此案遂大白于天下。袁世凯死了后，他才出狱。听说他在会审公堂判押西牢的时候，因头发被薙成一小圆形在顶上，曾与楚珩对视，忍俊不禁。入牢后，因反抗巡捕的无理，手被铐半日。据他自己说，初上铐时也觉得不好过，继而自忖，以为没有那双手，便无事了，作如是观以后，果然不为所苦。巡捕看见如此情形，深以为异，后亦不铐。有一次因他反抗得厉害，说要他于太阳下敲石子，西牢中所视为最苦工作的一种。他在牢中听说袁世凯死了，倒非常的不好过，一时甜酸苦涩都集心头。据他自己说，坐牢时，要以那一次为最难受。

他出狱后，正值各省恢复省议会。根据内务部的电报，凡因政治关系曾被取销议员资格者，一律恢复。他和赵鹏飞、梁钟汉系因政治关系，由黎元洪在湖北都督任内取销，自然应该一同恢复。在湖北省议会方面一致赞成。他到湖北后，前议长覃寿堃辞职。那时已无所谓国民党了，不过参加讨袁或反对袁世凯一派人有所结合，仍然推他为候补议长，投票结果，他以多数当选。因他当选议长，不仅官厅忌刻他，议会内亦有一派人反对他。官厅遂以他的议员资格系由议会同意除名的，不承认恢复，反对派更乐于赞同，于是他的议长当选了，议员资格还没有恢复。这一出滑稽

戏就那么样搁下来。议长问题，自后也无人敢提出，所以第一届的湖北省议会后半截没有议长，就是这个缘故。

他那时无事可做，遂将省议会中左倾分子团结起来，成立政治商榷会，郭炯堂为主任，他为副主任。改选参议员时，因研究系以大批款项来买，政治商榷会的人决定以消极的方式抵制，一连流会数次。研究系买得更厉害，最后他们不买你投票，只买你出席。于是乎商榷会动摇起来了，消极抵制的方法不能再坚持下去了。会中又没人有钱，最后才有一位投资的，始将商榷会的门面顾住。他于六年春又离开湖北，听说他曾到北京、奉天等处游了一次。他在湖北的时候，我们也时常见面，因他好打牌，就没有多谈什么。我在他离开湖北之前来日本③，我由汉口起程时是阴历正月二十日的早晨，雾很大，他特到船上来送我，谈了许多，现在也记不起了。

自在汉口船上分别以后，我们直到民国八年春上才在上海见着。我为什么到上海去呢？我和姚幹青④于七年三月间出四川，到万县时，听说蔡幼襄⑤在利川任鄂西靖国军总司令，我们写封信问问他的事体，他回信约我们去。我们去了，他就委在他司令部当秘书。中间幹青随着他往施南、往重庆，我仍留利川，直到阴历十二月幼襄回利川准备收束，派我、幹青往万县。我到万县十日，他就被方化南的部下所杀。事后检查证据，在电报局内检出唐克明等与方化南勾结，阴谋对付蔡部密电多通。鄂西靖国军同事诸人公推我到沪向各方申诉。我于各方都不熟悉，到沪后诸事很得他的指导。各方要人都会过面，但是解决问题要实力，蔡部无实力，所以案子也无结果，我那时只有在

上海暂住。那时郭炯堂、张眉宣⑥等都在上海，郭未几时回鄂。湖北旅沪同乡组织一湖北善后公会，推定眉宣和我两人驻会，租的房子在法租界霞飞路，那时他居在渔阳里，汉俊亦寓渔阳里，与湖北善后公会会址正对过，我们四人差不多天天见面。

世界大战中，中国有一种启明[蒙]运动，首先是文体的改革。主倡[张]文体改革的刊物是《新青年》，北京大学一部分教员和学生主张最力。另出一刊物名《新潮》，由文体改革进而讨论社会问题（当时主要问题为礼教、妇女、家庭诸问题）。我们当时看了这些刊物，同时由汉俊介绍几本日本新出的杂志如《黎明》、《改造》、《新潮》等⑦，我们虽然看不甚懂，也勉强地去看。杂志里面有的谈哲学，有的谈文艺，有的谈社会主义。我们看中、日两国的杂志，觉得当时有一个共同倾向，就是彼此都认[为]现代社会已发生毛病了，传统的观念、道德、方法都要改变了。至于怎样改变，改变成一种什么样子，都很漠然。就社会主义说，当时有的介绍无政府主义，有的介绍共产主义，有的介绍行会主义，且只有文字上的宣传，没有实际上的组织。

我们几人当时都是欢迎这种新的运动，很爱看此类的新书。质存平素好打牌，自从我们在一块，他简直没有打牌。说起来也很有趣，他说一向也是穷，但是打牌无论输赢，手上总有钱，现在没有打牌，竟一成[连]几天没有一个钱。那年夏季，他的衣服，甚至于蚊帐都当了，他只剩得一条小纺的裤子和一件汗衫。裤子每晚洗澡后一洗，次日再穿。长衫是和我共一件，但他绝不把这一类的事放在心下打缴，他仍然一心一意的看书。我们同看一样的书，

他看了后即能领略书中精义，并且能表而出之，有时书上没有发挥尽致，他更能补充其说。我和眉宣当时都笑他贩到货即出卖，卖的货反比贩来货漂亮，这虽是笑话，可见他的接受性和表现力了。他那时的倾向，很近于无政府主义，他以为只有摆尽一切束缚，人类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他这种观念，可说直怀抱到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民国十五年一月一日)前后，才逐渐淡散了。他的天分很高，向来对于科学虽然喜欢，可是没有学的机会。哲学、社会学、社会主义、文学这一类的书他都喜欢看，但没有专致力于那一种学问。他吸收的方面太多，又未提出一种作主脑。所以他革命的出发点始终未能确定。虽说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也没有什么动作，不过口头上常常露出来罢了。

眉宣于七月间回武汉，我到八月间也回武汉了。我们在上海时想在武汉办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报，因汉口虽然有大小报几十种，或资本不充，或人材不够，甚至有为军阀官僚作走狗，或专门以敲竹杠过日子，议论既不能动人，消息复多方抄袭，竟无一纸足以代表舆论，所以我们想干这一项事业。我们已将募股、章程、报社的宗旨及组织法都弄好了，定名为《江汉日报》。股票也预备印刷，但是没有钱。最后中山先生给了我一百块钱的川资，由这款里面取出四十几元作为印刷股票、章程、宣言的代价。宣言是他执笔，他用白话做的，虽是第一次试手，我们看了觉得很好。他不敢自信，当时戴季陶的白话文很漂亮，他特意送请戴季陶修改，季陶回信说宣言好极了，没有要改的地方，于是他才允付印。当时只想在武汉设立一种人民说话的机关，没有打算宣传某种主义，微含有不加入任何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派中，以免报社基础动摇的意思。我回武汉后向四川方面募款，先许我者，以后又缩了头。幹青虽然赞成，也没有力量。资本的来源全靠他向潮汕、广州方面募集了。他往汕头募股稍有头绪，政局一变，归于画饼。到广州亦无从说起，办报一事遂成泡影。据说他在汕头，初不打牌，不叫堂子，后因日与当地官商往来应酬，逐渐破戒。

我们自上海分手后，直到民国十年八月川军援鄂之役⑧，才在四川巫山鄂西总司令部见面。先是潘笑侯⑨、王玄奕等在四川和刘甫澄们联络，以准备乘湘军援鄂的机会一致动作。中山先生时在广东任大元帅，特派他和彭巨川往川。川军援鄂之议已定，在川鄂人公推潘笑侯为鄂西总司令。巨川回广东复命，他在鄂西军中参赞军事。我代表湖北全省自治筹备处往川请兵，行至夔府，听说笑侯们已到巫山，遂转至巫山。

因川军已发动，我无需又去重庆，只将自治筹备处公函送至刘甫澄处，我也随军出发，由巫山至巴东，巴东至秭归，一路上敌人早已退却，直到南沱（在宜昌西上六十里）宿营。前锋已抵宜昌城外东山与敌相持，鄂西总司令行营又由南沱移至三游洞。这是江北岸的一枝［支］兵，是四川第二军一部担任的。还有肃清江南岸的是张亚光带的兵，属四川第一军，早已至宜昌对岸。宜昌城外为一带山地，利于守，不利于攻。有一次已占领了东山寺，天晓时敌人见川军人数不多，猛烈反攻，川军遂败。当川军占领东山寺时，有一连兵奋勇冲至宜昌城内被缴械了。那时吴佩孚已将援鄂湘军击退，亲率舰队至宜昌抵御川军。北岸川军攻既不利，一时又无援兵，只有南岸兵可用。但四

川一、二两军积[极]不相能，无法疏通。他遂亲往南岸见张亚光，晓以利害。亚光允分兵助战。他连夜往返，行山路四十余里。吴佩孚新胜湘军，又亲临前敌，气势甚盛。南岸兵虽至，亦不能撑持危局，遂决定退却。

我们越天柱山至南沱，过了几天，又由南沱再退，经太平溪、翻铲子崖。我和他、潘怡如、王玄奕、罗定祉们一阵走，走时他的脚步最快，脚力不行的要算我了。铲子崖是江边子上的一个陡崖，光在远处望着，以为不至于翻那样高的山罢，我们走了几个钟头，看看还是在半山里，上到崖头我已没有气力，崖路如梯，每段相隔约二尺许，我是由他的勤务兵在后面推，另外还有一人拉，才上去的。我们一直退到秭归。战时我们没有多的事，有一天玄奕、质存和我，还有朱旭东到秭归东门外去玩，离城约三、四里的光景，有一座庙，庙的名字已记不着了。晚上就在城外一个人家借宿。那晚上我们谈的话很多，玄奕对于质存的短处说得最恳切，质[存]也接受他的忠告。

秭归还是守不住，再退。我记得是一个半夜的时候，大家出城去，质[存]和我还有一位姓何的一路走，出了城没有几远，我们三人就歇了，料到敌人未必就到，即令到了，我们空人也有法子走脱，所以大胆睡了半晚上。次日到巴东，县署的知事也走了，简直没有人负责任。那时天下大雨，我们赤脚草鞋，都象雨淋了的鸡，跑到县署内去，好容易才找到了几个干公事的人，叫他们去找地方的绅士出来维持地方的秩序。我们在巴东县内宿了一晚上，又过江到北岸电报局内住着。巴东自然也不是我们久站的地方，遂由火峰界岭退巫山。

一路都是大山，到巫山后，军事上又重新分配。四川第一军守北岸，第二军和鄂西军过南岸取施南，笑侯虽任总司令，其司令部不过是草草组织了一下。这次到巫山既决定过施南，特重新组织，从军人员裁的裁，留的从新分配职务。他们要我充司令部的秘书长，我觉得有点难处的地方，改用质[存]的名字任秘书长，他留夔府与各方接头，我代理他执行职务。我们先到建始，他也去过一次，住了一天，他就走了。他在总部时，一切计划他都参加，往来公文他也负责的批阅。他在夔府住不久，就代表鄂西军往广东。我们在建始见面时也谈了许多，不过当时革命意识都很含糊，知道要解放民众，要革命，实不知道唤起民众参加革命。他往广东去了，四川的局面逐渐变化，有一部分人竟勾结起吴佩孚来。我们在施南的一出滑稽剧，到民国十一年五月也就闭幕了。

他在广州任大元帅大本营宣传委员，可是那是一个名，实在没有宣传过。他每月有一定的薪水，他的生活也就很平凡，甚至做许多不应该做的事。十二年国民党改组，讨论容纳共产党的事，内部意见很不一致。可是赞成者是热烈的赞成，反对者也是热烈的反对。他以怀疑试验的态度处之，这是他事后对我说的。其实当时他没有把这种事认作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来研究。他平素好打牌，在广东熟朋友很多，更容易干这种把戏，差不多天天打。当革命潮流高涨时，居然有工夫做那样无聊的事，自然是没有心思顾及革命问题的一派人干的了。他虽然很关心革命的事，因打牌的缘故，日与无聊的人们相接触。那些人是老国民党，眼看见自己一天一天和党脱离关系，遂骂热心

办党者是共产党，热心做事者也是共产党。他对容共本无什么旁的意见，但是来他寓中打牌的人总是说的反共一派的话；他为要打牌，也就不理会。可是社会上就说他的寓所简直是反革命的窝子了，其实他对于办党的几个人，无论是否共产党都表示很敬服。直到孙中山先生去世后，他才深刻的感受着要办党。

十四年十一月间，奉国民政府的命令到江西，经过上海长江一截，他知以前的生活太过于耽溺，社会上革命的需要也不容许有革命性的人耽溺下去了，他的态度积极起来了。那时方本仁在江西正怀疑广东的政策。他到江西，极力宣传讨平杨刘[10]以后，国民政府是怎样统一军民财政，怎样得人民的拥护，和党与政治上的关系，并辩明没有施行共产。经他说明以后，始将方本仁的疑团一扫，广东的东北方面有了一个缓冲地带了。他回广东，又将江西及长江一带的希望国民党、国民政府的情形报告当局，以坚其信仰。国民政府任命他为刑事审判委员会的委员，他以未学法律辞了，改任国民政府参事。

我于他去江西的时候到广东。我那时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一分子。湖北与广东的交通，极感不便，省党部报告中央的事情往往被扣留。我们那时就用私人名义通信与他，要他向中央报告，这样才使中央和湖北的关系密切起来。我在湖北起程前有信知会他，他知道我要到广东去，所以他起程时就吩咐他寓中的人，说我到了那里，就搬到他那里住。湖北省党部自十三年四月成立，领了开办费一百六十元，直到十四年十一月我到广东才领到两千块钱。我的盘川是自己借的，当然不够用，幸而他吩咐人将我邀

到他寓中去住，才减少了我的无谓的麻烦。

他回来时中央已决定于十五年一月一日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早就通告各地方选举了。我到广东不久，湖北的代表就到了，我也是代表之一。湖北省汉口市及海外的代表到了许多，所以中央才将开会的日期决定。他为鄂军（当时因出发东江故未改定名称，后编入第六军）特别党部代表之一。我们住在一块，差不多天天是谈党的问题。为团结在广东的湖北人，我们发起组织了一个湖北革命共进会。本来在党指导之下，不应再设什么地方色彩的会，不过那时广东黄埔军官学校里有一个孙文主义学会，有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一右一左互相排斥，黄埔招生，又不限定是党员，并且不知会各地党部，所以学生中不能纯粹是赞成革命的。我们恐怕湖北学生走入歧途，所以设立这个会。会成立后举定他是一个执行委员。后来有一部分人以为他有什么政治作用，颇排斥他，这会也就若有若无了。

我们自民国十年在建始分手后过了四年才见面。他在这个中间，生活虽是很放荡，却看了不少的书，如文学、哲学、政治、社会、经济等类的书，在国内出版的只要他买得到，他就去买，买了就看。因为他看的门类很多，所以不能有深刻的研究。加之他的天分本高，容易领悟，但仅涉猎一过而没有反复的钻研，所以不能有所著述。我常常问他："你有语言的天才，又任宣传委员，为什么总不演说？"他说："不愿意说敷[肤]浅的话，且一点意思反反复复的说，也觉得乏味"。我说："说话的深浅要看听的人的程度，如在大学当教授，听讲的是专门毕业的学生，当然要讲深

一点的话。现在是要唤起民众，应该是愈浅愈好，且反复的说明也很要紧。广东自打平杨刘后，作了许多宣传，但是一般人民对于党的主义和政策明白了多少？主义和政策是决定了的，民众未明了以前，我们除了反反复复的说明有什么办法？”最后他也很同意我的话。

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他提了几个重要的议案，政治报告决议案是他起的草。在会议时蒋介石作了军事报告以后，有李子峰提议全体起立向蒋致敬，主席未咨询大会遽令全体起立，他去信质问主席团，所以会议记录把这段滑稽史删掉了，就是他一信之力。他当选为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大会毕后，奉国民政府的命令，驻上海为代表与各方接洽。

五月在广州开第二届第二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开会本系因三月二十日事变，汪精卫出国，党中顿失重心，蒋介石等提出整理党务案，而右倾分子想借势推翻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那时共产派不便多说话，左的一部分[憋]气不出席，出席的也多不发言。他出席后根据正义，无所回避。决议结果多出于他的主张，往往反于提案者所豫[预]期。那时右派很得势，左的分子如甘乃光、顾孟馀、何香凝、陈公博、邓演达和他想团结起来，商议了几次，没有什么结果，以后遂入于北伐时期了。

在决定北伐之前，我们和何雪竹、蒋雨岩商量在湖北的准备工作，我们四人分途与蒋介石、谭祖安⑪、李任潮⑫、张静江面谈。结果由政治委员会决定在湖北组织一特种委员会，专任探听敌人政治军事上的消息，报告总司令部，并得接洽队伍扰乱敌人后方。当指定潘康时、刘孝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